■红兵说话

房子：现在买不起，将来会租不起

◎葛红兵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学博士

中国应开放农民地产的市场准入，平抑当前房价。中国的房价现在是不正常的。是因为中国地产的城乡二元结构。应该改变的是这个结构。这样地产价格才能降下来，才能接近真实价格。这个要我们大家一起呼吁。

一个朋友来问我，该不该买房？我说，若是自住，不买也得买，别希望房价会跌下来。我不想安慰他，我知道房价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跌下来。

国内房价奇高的原因在哪里？主要的是因为土地人口比。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少，政府不能不控制土地供给，到处都是房子，哪里还有土地种粮？所以，地产地产，最终总要因为这个人口土地比而不断地涨价。地用一块儿就少一块儿，而人对住房的欲望却是一茬一茬地在增长，这个矛盾永远无法解决——解决不了。

所以，该买的还得买。长线看，房价总是要涨的，且涨幅会远远超过银行利息。现在你说你买不起，老实说，将来你会租不起——存款利息高了，房租会提高，而且会比利息提得快。

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短线，中国的高房价有特殊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是不正常的。有人说是开发商搞鬼，我不这么看，开发商搞鬼只能逞一时，而且风险很大，如果后面有很多新房源上来，他捂盘惜售，哄抬房价，不是自寻死路么？

照理说，按照市场原则，价格高了，应该增加供给，才能平抑价格。但是，中国恰恰在这个上面是反过来的，房价高了，大家都有意见，本来加强土地供给，降低房地业务介入门槛，多造房子，价格就降下来了？为什么不那样做呢？

所以，我说，政府最好的做法是：增加土地供给，鼓励房产开发，让更多的房子上市——那些开发商也好、中介商也好、投机客也好，面对大量上市的新房源，他们的联盟会不攻自破。

有人说，政府没有那么多地，而且地供应多了，房地产过热，容易伤害经济发展的节奏，造成经济过热，云云。后一个问题，我不谈了，留给经济学家去谈，前一个问题，我谈谈。

中国还没有到真的没有地造房子的地步，中国现在之所以地不够，是因为城乡二元土地结构。农民有很多宅基地，但却没有上市资格，不能形成有效的土地供应，不能在市场上流通。这就把中国大部分的宅基地限制在了土地市场之外。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农民的宅基地被人为地剥夺了交易权，实际上也就剥夺了他们的所有权，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失地，但是，他们的地权价格却没有真正地被市场化衡量——他们的地皮被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拿走了。

中国农民没有享受到近30年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地产增值的福利——城里人买房之后，地产增值，现在很多人都是拥有数十万地产的中产阶层了，但是，农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们的地产不值钱。

我的意思是：中国应该让农民的地产和城市市民的地产等值，在一个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样，中国的房价就会降下来。在北京，同一地块，小产权房子不就比大产权房子便宜一半吗？道理就在这里。

其实政府解决住房问题有很多模式可以借鉴。新加坡是政府造租屋，多数居民住在政府造的租屋里，房价很平稳。中国政府应该学这个模式，因为中国和新加坡类似，土地很少。

另一个模式是澳洲的。我刚刚去过澳洲，那里是土地私有的，任何人花10万澳元左右，就可以买一块拥有永久产权的地皮，然后，可以自己造屋子——再花10万澳元左右，你就拥有一处占地一亩半，800平方米左右的花园住宅了。这个模式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开发商。这样下来，房价不容易大涨——因为地皮掌握在个人手里，不容易垄断，不被机构垄断，也不被政府垄断；人人都可以自己盖屋子，开发商就只能帮助业主造屋，而不能主宰市场。当然这个模式，要土地私有化。中国现在可以借鉴的是：农民如何享有地权？

真正的财产是地权，这也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因为有地，你的财产才有着落，其他产权都是附带的。现在的问题是：改变农民状况，让他们享有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力，需要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社会公义的要求。

其实这也是环保的要求。中国环境出大问题，关键是地权不明，你只能用，不拥有，谁会爱护呢？本来只能放牧100头牛的牧场，结果被放了1000头，因为牧场不是农民的，他放几年，就交给国家，他当然把牧场放到沙化为止，黑窑工厂主挖粘土的地不是自己的，他挖了就走，他干吗不挖到地球的那边去？——不要责怪大家的私心，没有私心的人是没有的；现在的问题是：谁都说这是我们的祖国，但是，谁都不拥有这个祖国——结果祖国被挖得千疮百孔。

如果城乡地权平等，中国的房价马上就会降下来。否则的话，现在买不起房子的人，将来会租不起房子。

■大英小语

伦敦对美国表亲很见外

◎李俊辰（jonsson.li@gmail.com）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

英美一向被人相提并论。在许多问题上，作为盟友的英国和美国也是相当一致。众所周知，英国在欧盟中长期游离于“法德轴心”之外。从法德等国坚决反对的“倒萨”的伊拉克战争到伊战后的重建，英国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但是，就在英国，许多英国人却把美国人都看成“老外”。剧作家肖伯纳曾经有句名言，称英美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割的两个国家。

伦敦是个多元文化世界大都市。作为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地和全球金融商业中心，伦敦的多元化活跃性给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旅居之人带来强烈的归属感。这里被使用的语言多达三百多种，各种文化在这里交织。当然，其中少不了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伦敦的贡献。

今天，观光旅游业是伦敦的第二大工业，而到伦敦来的游客最多的是美国人，每年超过三百万，占来伦敦的海外游客的20%以上。而且，伦敦25%的观光收入来自美国游客。分辨美国游客，除了他们的美式英语外，其行为举止和穿着也与英国本地人大相径庭。美国游客的衣着比较鲜艳、休闲，带着最新式的照相机和摄录机，是必给小费的一族，这可能和他们在美国的习惯相似。因此，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餐馆和酒店的工作人员，最欢迎美国游客。在伦敦念硕士时，一位在“必胜客”打工的同学说，每到用餐时间，侍应生都纷纷打足精神，打量食客。这些“经验丰富”的侍应生往往能从衣着打扮判断食客是美国人还是意大利人。一旦确认是美国人，他们的热情度就达到了120%。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资料显示，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入成交额有时一天可逾五百亿美元，占全世界欧洲美元成交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在伦敦，尤其是在伦敦金融城，美国人很不少。在伦敦，他们可以被称得上是“最本地化”的美国人。

可是在英国的大学中，不少人认为美国人“虚伪”。我有一个朋友，理查德教授，他的许多中国弟子经常向他反映美国同学对他们敬而远之。这些中国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理查德教授是专门研究亚洲和欧美关系的学者。他接触过许多来英国进行“美国战略和国家安全研究”的美国学生。据理查德教授的观察和了解，他认为美国学生来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未来如何跟中国打仗。因此，这些美国学生对于中国人的任何言行都持谨慎态度。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由于大国心态和充当世界“领导者”的一贯作风，在伦敦的美国人也不时与本地人和当地政府发生矛盾。

自2003年2月17日开始，为缓解交通拥挤问题，英国伦敦市政当局开始对进入市中心八平方英里区域的机动车辆实施征收5英镑入城费，2005年7月至今提至8英镑。从2007年2月19日起，交通拥挤收费区被扩展到伦敦西部。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交通收费计划之一。逃避交费者会被设在路口的摄像监视系统自动记录下来，并会被处以超过100英镑的罚款。

可美国大使馆偏偏要向这项规定“挑战”。2005年7月，美国新大使塔特尔到任后，美国使馆就称，按照国际法规定，外交人员不缴税，因此美国使馆拒绝支付入城费。伦敦政府在警告多次无效后，向美国使馆寄送了由伦敦交通管理局统计的近百万英镑的罚款单。伦敦当局强调入城费不是税，而是服务费。虽然伦敦政府的做法得到了英国外交部支持，然而，美国大使馆就是不交。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一怒之下，骂美国大使是个“想钻空子的骗子”。此言一出，英国媒体一片哗然，市长和美国使馆都成了当时的头条新闻。

就在年前，英国市场调查机构弗雷泽咨询公司首次就著名国际品牌的“道德品性”向1300名英国消费者调查。结果，由于近期英国掀起了一场健康饮食潮，英人对体形和健康越来越重视，麦当劳这个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一直很成功的零售品牌在英国的发展遇挫，成了调查者心目中声誉最差的企业。“吃得更健康”的风气在英国，尤其是伦敦地区日趋流行，伦敦倡导健康生活的人士纷纷指责麦当劳的食品会助长肥胖，一些非政府组织更在伦敦繁华地段的麦当劳门口举行抗议活动。虽然麦当劳一度在英国各地投入大量资金重塑品牌形象，推出健康食谱，但是收效不大。2006年，麦当劳在欧洲的销售利润已经从15.6%下降到14.9%。

每逢夏天，“风情万种”的伦敦和英国其他旅游胜地都会迎来游客的高峰。据说，为了避免“丑陋的美国人”形象在英国发生，美国的一家咨询公司曾提出几条美国人游访伦敦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不要争论和大声喧哗。这是因为许多美国游客在伦敦的地铁和汽车等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而被许多当地人“投诉”和“抱怨”。看来，似乎向国人提出出国建议并不是中国相关机构和媒体的专利。

不过，英国旅游局的一位发言人却表示，大多数美国游客并不需要这种“须知”，他们行为并不过分，伦敦是非常欢迎美国游客的。看来，美国人的高消费能力令英国官方也不得不低头呀。不过想想也对，毕竟，美国人花了钱，为伦敦的经济作了贡献，说话大声点也无妨。

也有英国人认为美国人都是自以救世主的心态来看待世界。他们看世界、看英国都是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对别人的任何事情都指手画脚。另一方面，笔者不少在英国的美国朋友却抱怨说，英国人不喜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跟着布什走，但也不能因为反对美国政府的强权外交以至迁怒到他们这些普通美国人身上，真是令人有点吃不消。一位朋友甚至说，伦敦的反美情绪简直有种族歧视的倾向。美国朋友露丝说，她希望英国人明白一点，那就是把亲美国和支持总统的行动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露丝是因为不喜欢住在美国才来英国的。她坦言，这就其来说，只不过是选择到另一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但她说她永远是美国人，而且为此自豪。

■东鳞西爪

靠什么来弘扬中华文化

——从日韩明星加盟《水浒传》重拍而想到的

◎周 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根据古典小说《水浒传》重拍的电视剧，将使中、日、韩明星同上“梁山”。

说起来，《水浒传》在日本、韩国，影响很大。日本享保十三年（1728年），京都书肆文会堂九兵卫家《忠义水浒传》一至十回刊本问世。此书系冈岛冠山（1674~1728年）据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点忠义水浒传》训点而成。日本宝历七年（1757年），他用汉字混和片假名编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由其后学付梓。后经三十年出齐。古代朝鲜不仅翻译《水浒传》，还编有《水浒传》小说语汇解》。难怪，电视剧出品方认为，启用日、韩演员，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

《水浒传》外文译本还有很多种。在西方，七十回本《水浒传》的德文本和法文本，书名分别是《强盗与士兵》和《中国的勇士们》，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有英文本的《梁山泊的强盗》、意大利文本的《匪徒》等。美国出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较好的外文本。美国犹太裔学者西德尼·夏皮罗（Sidney Shapiro，又译沙博理）根据一百回本《水浒传》翻译的《水泊好汉》，更被认为忠于原著和反映原文神韵，符合翻译的“信、达、雅”原则。尽管《水浒传》颇受西方读者欢迎，但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演员未能参加电视剧的拍摄。这是否与他们碧眼金发，外形不像梁山好汉有关，不得而知。越南是汉文化圈国家，《水浒传》也十分流行。可能是越南没有什么大牌演员，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角色轮到他们。

从理论高度系统研究《水浒传》的第一人当属金圣叹，经他剖析后，小说的复杂性要远超当时已经成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提出的基本政治观点是：小说“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因此，宋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反面人物。在他之前，不少批评家如李卓吾等已把宋江作为反面角色看待。小说作者施耐庵也不否定宋江行为的违法性。《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卷十三分别有回目曰《关云长义释曹操》、《张益德义释严颜》。而一百回本《水浒传》第十八回的回目是《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这里，作者没有使用当时的流行语“义释”，而是使用“私放”，就是用“非法释放”的法律评判代替“重江湖义气”的道德评判。

宋江被看作正面人物，与施耐庵用的笔法不无关系。“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五回回评）金圣叹对宋江的评价过于极端。但宋江的一些不良品质确实需要细看，才能察觉。他架空晁盖，不遵遗言，“纯用术数去笼络人”，都有案可稽。因此，《水浒传》塑造宋江形象的难度，相当于要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刻画成昭烈帝刘备，但又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其奸诈的一面。

经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成了断尾巴蜻蜓”（鲁迅：《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但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等《水浒传》从此不再流行，七十回本《水浒传》基本一统天下。这本身说明，金圣叹的建树是不容否认的。

只是，日本、韩国的明星能吃透《水浒传》的精神吗？“《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袁无涯：《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从外文译本的名称看，国外对《水浒传》的理解缺乏深度，也未形成什么独特视角。外国读者主要热衷于《水浒传》的情节。研究《水浒传》的学科，叫水浒学。这就像研究《红楼梦》的学科，叫红学一样。水浒学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国内。中国水浒学会成立于1987年。有其学术刊物《水浒争鸣》。汉学家尽管也有研究《水浒传》的，但成果远远逊色。日本、韩国的明星都未必熟练地掌握中文，还能进一步体会《水浒传》并演好梁山英雄？是得打个问号。

重拍《水浒传》是好事。不过，如何让演员最大限度地吸收水浒学研究成果，从而提高对《水浒传》的理解水平，恐怕是重拍《水浒传》的更重要环节。而中国演员无疑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依靠国际明星“撑门面”，也许有利于电视剧在日本、韩国的推广。但如果这要是以牺牲《水浒传》的历史厚重为代价，则并不有利于这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产生更为深远的国际影响力。

■心雨

思维的花朵为何失去了思维？

◎张赐琪
社会学研究者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三个月前，一部令世界动容并引发思考的书在美国问世——《没有我们的世界》，它从假设的角度，对可能发生的人类这一种族的突然灭绝以及其后的世界演变作了大胆推断。作者艾伦·韦斯曼在书尾提出了结论性观点：人类要想作为当前生态系统的一分子留存下来，就要更多地注重保持生态平衡。其实，这样的观点我们并不陌生。多年前，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阿尔贝特·史怀哲在他“敬畏生命”的演说中就曾向这个物质的世界大声疾呼：一切生物（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

史怀哲不无悲哀地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突飞猛进，物质财富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创造并发展着，人类这艘快速行进中的航船，却因为缺少伦理精神的引导而偏离了航线：物质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拥有比其他生命更多的权利，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随之日趋恶化。物质至上观给文化带来的最普遍危害就是人的物化和被奴役，精神生活匮乏和人文意识淡薄……这一切令青年时代的史怀哲陷入苦思：当代文化是否还有不可或缺的伦理动能？它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

沿着这一路径探寻下去，史怀泽看到，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单极作用下，“人正失去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自由、思维、理性、价值、人道和精神，人类的文化理想不再能被清醒地思考和追求，而是在迫切的生存斗争中被扭曲；知识程式正在取代独立性的思维”。史怀泽为人类“思维着的花朵”失去思维而痛心不已。

作为拥有哲学、医学、神学等多个博士学位的公共知识分子，史怀泽认为，知识的价值所在和对社会的最大责任，是向人们展示更好的生活前景。知识分子可以是思想家，也可以是行动者。作为思想家，可用自己的思想之光，给正在路上艰难行走的人们增添信心；作为行动者，不是为行动而行动，而是要去践行自己的思想。

1905年，史怀哲决定放弃所有的事业和地位，用八年时间转而习医。1913年他以医学博士的身份携新婚妻子去了当时的法属赤道非洲的兰巴雷内（今加蓬共和国境内），开始了终其一生服务非洲的生命历程。

在长达50年的行医经历中，史怀哲目睹了非洲人民艰苦的生存境遇，体验了生命的脆弱与顽强，开始反思传统的生命哲学和伦理思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作为战俘从非洲遣送回欧洲。黄昏时分，他看到夕阳下几只河马在自由击水的情景，这与惨烈的战争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的爆发，尤其是核武器的使用，致使无数鲜活的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战争所暴露的人类伦理精神的危机，让史怀泽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用“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来捍卫所有生命的尊严，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然而，在灵肉分离的凡俗年代，更多的生命个体则陷入二元背离的尴尬处境：为了追赶潮流，物质主义的氛围和压迫越来越沉重，几乎压垮了存在的意义；精神的高远、心境的辽阔，灵魂的安详，已然失去了本源的光采，颓变成生命的疑难。“平静地生活”已不再是个体守望的生命意向，全民逐鹿的财富意志只剩下了物质主义的滥觞。有人用“赤贫的精神”来诠释眼下的生存状态，似乎并不为过。

显然，生命意义的自决是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史怀哲选择了尊重一切生命，并将有限生命直接服务人类和无限自然，信仰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多彩与永恒；反之，当人的企盼只限于一己之利时，凡俗生命的卑俗就会与你如影随形，日渐衰败的肉身不再可能成为灵魂的栖息之所，反将变成它的限制。或许你也会感受快乐和满足于一时，但发达之后的孤寂，快乐之后的痛苦，满足之后的虚无将接踵而至，难觅持久的平和与喜乐。

面对人世间不尽苦难的不尽追问，便是永恒之门的开启。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质疑使人的心智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博爱的理想和生命的和谐。

因此，史怀哲虽已辞世四十多年，仍是全球后继者们最尊敬、最仰慕的人。在世界各地，以史怀哲命名的团体和组织在经年累月地开展环保、反战、动物保护和人道救助等工作。他的著作，在我国读者中同样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据不全统计，在“百度”和“谷歌”网站上，分别有34000和240000条相关信息。近年来，我国出版的数十种“生态伦理”著作中大多引证了史怀哲的观点。

史怀哲的生命实践，将我们引入一种由于敬畏生命伦理观而变得与比过去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谋求人类与自然，与世界的和谐共处。它让思维的花朵重新绽放。